

云南的圣境及其在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意义

罗 鹏, 裴盛基, 许建初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4)

摘 要: 圣境是由于传统信仰文化的原因而建立和被保护的一类特殊自然—人文景观单元。对圣境的起源、分类、在云南的分布和数目、生态价值和其它特征进行了描述和举例分析; 提出了传统信仰文化和将乡土保护体系运用于农村生态恢复和生物多样性管理的潜在价值, 以及将其纳入现代保护和开发项目的必要性。

关键词: 圣境; 环境保护; 生物多样性管理

中图分类号: X76; B92; Q14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云南具有十分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条件, 素有“动植物王国”之称, 是世界上物种丰富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加之云南的物种又具有较高的特有性和珍稀性, 云南的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世界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随着人口急剧增长, 对资源的需求和利用强度不断加大, 导致不合理资源开发活动和环境破坏, 突出表现在天然森林植被的减少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已成为云南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生物多样性是一定区域内所有生命体及其所组成的生态系统和相关生态过程的总和, 是一定区域内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长期相互作用的产物。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两者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1]。由于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人文文化范畴的问题, 人文因素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2]。充分利用文化的力量, 保护和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 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仰文化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一直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即使在今天, 仍然对大多数民族的心理、行为以及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管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信仰文化在自然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已引起世界范围

的广泛关注^[3,4]。圣境作为信仰文化作用于自然资源管理和对景观塑造作用的具体体现, 在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本文拟在对圣境的概念、种类、形成等基本特点进行描述的基础上, 对其生态价值和在现代自然保护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加以初步归纳和分析。

2 圣境的概念和分类

2.1 概念

所谓圣境, 是指由于传统文化信仰的原因而受到崇拜、禁忌和保护的一类特殊自然—人文景观单元。如人们常说的神山、龙山、风水林、龙泉及宗教庙宇所在地等。在国外文献中, 这类景观单元的名称也有多种, 如圣林(Sacred Grove, Holy Forest)、圣山(Sacred Hill)、圣地(Sacred Place)、宗教林(Religious Forest)、宗教庇护地(Religious Sanctuary)、圣景(Sacred Landscape)等。本文采用圣境(Sacred Site)一词, 以涵盖所有这些类型。

圣境中通常都有圣物(Sacred Items)(如佛像、神灵或祖先雕像、小偶人灵牌、护神符、神杖、法器及道具, 也包括神树、神兽等)的存在, 但圣物必须与周围相关的环境, 包括自然和人为环境一起构成圣境。因此, 一尊佛像并不构成圣境, 而是与相关的建筑物和周围的物理和生物环境一起构成圣境; 一棵神树也不是圣境, 而是与相邻的其他植物及其生境一起构成一个圣境。在这里, 受崇拜的对象除了佛像、神

收稿日期: 2000-12-16; 改回日期: 2001-03-05。

基金项目: 美国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及云南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资助。

作者简介: 罗鹏(1965-), 男(汉族), 四川成都人, 现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树外,连同周围相关的物理—生物环境也被另眼相看,受到特殊的关照和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圣境实际上是一类特殊的生态系统,它通过文化信仰、崇拜仪式,以及相关的经济和生态过程而与外界保持密切的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流,是高度开放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一类特殊的有形结合。与其它类型的生态系统相比,圣境在文化内涵和管理方式上有其自身特殊性。并具有种类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等特征。

2.2 圣境的分类

不同的圣境显然是与不同的文化信仰相互联系在一起。如所谓的神山、龙山,主要与原始自然崇拜和神灵崇拜有关;坟山、风水林、宗祠等主要与祖先崇拜有关;而名人祠则是圣贤崇拜的产物;佛寺、道观和一些宗教名山则更多地与神学宗教联系在一起。然而,多数圣境与特定宗教信仰并不存在明确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具有双重甚至多重文化渊源。如西藏的阿尼玛卿山,对其的崇拜和保护,既有佛教的因素,也有地方原始宗教和神话传说的因素;白族的本主庙中,也有佛教杂入之神;一些圣境即使从表面看,也是宗教复合型的,如泉州三清山,集道、释、伊斯兰教于一体。难以根据其信仰文化背景进行分类。为方便研究起见,根据自然和构成特点以及空间规模,可将圣境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1. 山林自然圣境。其特点是以自然物(植物、动物、岩石、山体)为主要构成,大小从 $n \times 10^2 \text{ m}^2 \sim 1\ 000 \text{ hm}^2$ (n 为自然数)不等。包括常说的神山、龙山、神树林、龙箐、坟山林(风水林)等。

2. 庙祠人文圣境。其特点是以人文建筑物(塔、殿、塑像、石刻等)或建筑群为核心,与相关及周围自然物(庭院植物、水塘及相关树林等)有机结合构成。包括佛寺、道观、喇嘛庙、教堂、清真寺、本主庙、土地庙、城隍庙、龙王庙、宗祠、名人祠等。

3. 名山圣境。包含一个以上庙祠人文圣境或其他圣境,并以宗教信仰寄托地和优美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的自然—人文复合山地景观。其空间范围从几平方公里至上千平方公里。相当于常说的宗教名山^[5]。这类圣境占我国名山总数的三分之一。较为著名的如佛教四大名山(峨嵋、五台、九华、普陀)及云南鸡足山、浙江天台山等;道教四大名山(青城、武当、龙虎、三清);藏传佛教朝圣地冈底斯山主峰冈

仁波齐峰、阿尼玛卿山等。

4. 水体自然圣境。以天然水体为主要崇拜和保护对象的圣境。面积可以变化很大。如龙泉、圣湖(河)等即属于这类圣境。较为著名的如长白山天池、宁蒗泸沽湖等。

3 云南各类圣境的基本情况和生态意义

云南不仅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而且也是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在信仰文化方面,各少数民族除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多神灵和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外,还不同程度地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几乎囊括了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主要宗教现象。丰富多彩的信仰文化,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圣境和圣境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圣境的存在和保存是以信仰文化的存在和保存为其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因而各地区或民族在这方面的历史和现状与各地区圣境的类型、数量、分布、管理及保护状况存在直接的关系。

3.1 山林自然圣境

山林自然圣境是云南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同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圣境类型。据调查,云南大多数少数民族,如傣族、布朗族、基诺族、纳西族、佤族、彝族、傈僳族、独龙族、白族、苗族、怒族、哈尼族、拉祜族等等,均有将村寨周围某些地段(山、树林等)视为禁地,认为是神灵、鬼怪或祖先亡灵栖息场所,并加以崇拜,进而制定具体的禁忌措施而加以维护的传统。一般有禁止砍伐、开荒耕种、翻动石头、放牧和污染水源等措施。并在特定时间加以祭祀,以强化人们对圣境的重视。山林自然圣境主要与原始崇拜(特别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多样性。既有民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和等级之分,又有大小和受保护、重视程度的差异。

历史上,山林自然圣境在云南的存在极为普遍。一般情况下,每个村落附近都有公共的神山、神林等。由于不同的神灵需要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因此每个村寨实际上可有多多个山林自然圣境,占据的总面积也较大。如西双版纳勐宋哈尼村寨,其山林自然圣境包括“地母圣林”(“地母”居住的树林)、“普仓”(分隔人界和鬼神界的树林,即村寨防护林)、“老蹦”(坟山林)等多种类型^[1];西双版纳勐养布朗村寨

的山林自然圣境有自然神灵崇拜的龙山和祖先崇拜的坟山林两种; 而楚雄彝族村寨有龙树林、山神林和风水林三种。此外, 在云南一些地方还有一种特殊的山林圣境, 如西双版纳哈尼地区的 sangpabawa (意为傣族土司的藤类保护林)、宁蒗摩梭村寨的土官林等, 这里, 传统政治和对政治力量的崇拜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

除类型的不同外, 山林自然圣境还有等级的不同。等级高通常面积也较大。如西双版纳傣族的“神山”(自然神灵崇拜的山林圣境)可划分为“Nongman”和“Nongmeng”两个等级。前者为某一村寨所有(面积 $10 \text{ hm}^2 \sim 100 \text{ hm}^2$), 而后者为若干村寨所共有(面积多 $> 100 \text{ hm}^2$); 类似的情况还有宁蒗普米族村落的“罐罐山”(坟山)等。而且, 不同的山林自然圣境的管理强度和保护程度也存在差异。如在勐宋哈尼村寨, “地母”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因而“地母圣林”受到绝对的保护, 一草一木也不能动; 而对“普仓”林, 除不能砍伐树木外, 可以在其中采集草药、野菜和水果。

山林自然圣境是云南最具特色的圣境类型, 其产生早于其它类型的圣境, 是传统信仰文化, 特别是原始崇拜信仰对景观的建造作用和对自然环境保护作用的典型体现。它反映了人类早期和传统的环境观、生态观, 并与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及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农业景观中自然植被大量被破坏的背景下, 山林自然圣境主要以残遗森林缀块的形式存在。目前, 它仍是一些地方, 特别是边疆各地州的一些地方最重要的, 甚至是唯一的自然保护地。

山林自然圣境在区域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保护了一些重要的植被类型。例如, 据《云南植被》^[6] 记载, 以箭毒木 (*Antiaris toxicaria*)、龙果 (*Pouteria grandiflora*)、橄榄 (*Canarium album*) 为标志的干性季节性雨林, 分布在西双版纳的各山间盆地上, 目前仅只在“龙山”上有存在; 其次, 保护了大量的植物物种, 其中不乏具有重要科研和经济价值的植物, 包括药用植物, 也有许多珍稀、濒危植物, 如大叶木兰 (*Magnolia henryi*)、箭毒木、四数木 (*Tetrameles nudiflora*) 等等^[7,8]; 第三, 位于自然保护区周围或之间的山林圣境, 可能起到各自然保护区之间物种交流“踏步石”(Stepstone)的作用, 从而提高保护效果; 大部分山林自然圣境紧靠村寨和田园, 具有十分明显的水源涵养和防止水土流失作用^[9]。此外, 一些

山林自然圣境还通过为村民提供部分食用、药用植物以及天然有机肥料(枯枝落叶)等而对村民的日常生活、生活产生生态和经济的多重作用。

3.2 庙祠人文圣境

云南的庙祠人文圣境也显示了极高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庙祠, 从最原始的, 到各种神学宗教的现代庙宇, 在云南都能找到。以佛教为例, 云南的佛教包括了巴利语系、藏语系和汉语系三大部派, 是全国唯一的佛教三大部派汇聚并存的省份。可以说, 云南的庙祠人文圣境, 既完整地反映了本土宗教演化的各阶段, 也反映了大范围内区域及国家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

据统计, 云南省现有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的宗教庙宇总数达 4 333 余处, 信众遍布全省各地^[12,13]。此外尚有为数众多的其它庙祠人文圣境, 如各地的宗祠、名人祠(圣贤祠)、本主庙等, 其具体数目及分布情况等尚无完整的调查材料。释圣严^[10] 认为, “英文的寺庙(Temple)一词的原意即是树木, 因为原始人类即是以森林作为庙宇来祀神。”由此可见, 庙祠人文圣境在发生上与山林自然圣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对自然物(森林、树木)的崇拜和保护在庙祠人文圣境同样占有重要地位。例如, 许多原始植物崇拜对象, 如松、柏、竹、榕树、大青树等, 有从村头、路边、树林向庙祠人文圣境汇聚的现象, 成为庙祠人文圣境中“古树名木”相对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11], 在云南的各种庙祠人文圣境中, 共收集到现存名树、“宝树”77 个科, 338 个种。

大多数的庙祠人文圣境均包含特定植物的栽植和维护。许多小乘佛寺庭院植物表现了宗教与植物的密切关系。据手抄本傣泐文经书《二十八代佛出世记》的记述, 二十八代佛主均有自己的“成道树”, 经鉴定包括 18 个植物种, 常见于小乘佛教寺院中, 并深受信徒们的崇敬和保护^[14]。当地传统法规规定, 砍伐菩提树与破坏佛寺、杀死僧侣同罪, 要“判处死刑, 其子女罚为寺奴”, 可见处罚的严厉和宗教植物受重视的程度。裴盛基^[9] 曾对西双版纳二十多座佛寺(上座部佛教)庭院栽培的植物进行过统计, 发现目前常见的约有 58 种, 大部分为外来植物, 其中一些是仅限于佛寺内栽培的宗教植物, 这些植物的引入和传播又与宗教文化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在传统上座部佛教寺庙中, 都普遍强调“五树六花”为庭院栽培植物的基本特征。“五树”是菩提树(*Ficus*

religiosa)、高榕 (*Ficus altissima*)、贝叶棕 (*Corypha umbraculifera*)、槟榔 (*Areca catechu*) 和糖棕 (*Borassus flabillifer*)，“六花”是荷花 (*Nelumbo nucifera*)、文殊兰 (*Crinum amabile*)、黄姜花 (*Hedygium chrysoleucum*)、鸡蛋花 (*Plumeria rubra*)、缅桂花 (*Michelia champaca*) 和地涌金莲 (*Musella lasiocarpa*)。当然，在不同的地区间，“五树六花”的种类略有不同。据估计，西双版纳传统上座部佛寺庭院栽培植物总数在 100 种以上^[14]。这些植物，加上庭院内其它野生、半野生植物，以及庙祠周围的、被群众自发保护的树林，或者庙祠以外作为“庙产”、“寺产”的树林、草地，共同构成“宗教植物园”，其面积，往往远远超过庙祠建筑本身，是庙祠人文圣境的重要内容。

庙祠人文圣境还通过与之有关的宗教、文化和经济活动而对周围环境，包括植物环境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作为宗教活动中心，需要大量物质材料的支撑，其中有许多是植物材料或植物产品，其原植物既来自圣境，也来自圣境以外的地方，并不同程度地赋予宗教文化的色彩，受到信徒们的崇敬和特别关照。对这些植物的引种、栽培或自觉保护，扩展到了庙祠人文圣境以外其影响所及的其它地方。

3.3 名山圣境

虽然从名气上讲，云南的名山圣境多不如内地，但在数量上仍是丰富的省份。据作者不完全统计，云南的名山圣境总数约在 100 处以上，其中不乏著名的风景名胜。如昆明西山、武定狮子山、禄劝轿子山、大理点苍山、宾川鸡足山、巍山巍宝山、威信观斗山、景东哀牢山、楚雄紫溪山、德钦梅里雪山、腾冲云峰山、哈巴雪山等。

在各种宗教中，小乘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与世俗生活有更为密切的联系，而在多数情况下与名山圣境的关系显得不是很明显。在云南，大乘佛教、藏传佛教和道教与名山圣境的形成有更为密切的关系。以下试以大乘佛教和道教为例，说明这两种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名山圣境的关系，以及在环境选择上的一些基本要求。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谓“地之美者，则神灵安”。道教和大乘佛教总是趋向于择具有秀丽自然风光，天然植被保存完好，并有多样化生境的名山大川作为修炼场所。以道教为例，道家讲究崇尚自然，返璞归真，以达到超脱世俗，修炼成仙的目的。何为“仙”？据《释名 释长幼》的解释，“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认为山林是最好的成仙

之处，故名山大川成为道家竞相居住之处。在道观选址问题上，十分注重两点：一是要有保存良好的森林，二是要求多种自然生境的存在和一定的空间组织（即风水的环境形势）。如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城南 11km 处的巍宝山名山圣境，原是南诏发祥地，后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著名道教胜地之一。该山的环境形势，可从《巍宝山志》略见一斑：“地处巍山盆地之南，一山从盆坝突然升起，南枕太极顶，北与大理点苍山相望，东有五道河……，西有阳瓜江……”，后山“主峰耸峙……，前山山势平缓……”。而分布在山中的几十个道观，其选址也有复杂的环境要求：通常后有靠山，左右龙虎之山护卫，前方开阔，或有流水环绕^[15]。可见，名山圣境的内部环境条件是极为多样化的。除保护良好的森林外，山峰有高低、大小之分，地势有陡峭、平缓之别，而且山、水相间。为多种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

大乘佛教名山圣境的情况也相似之处。佛教主张积善行德，清心寡欲，以期脱离尘世，达到涅槃境界。总之，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而中国传统观念如风水所追求的理想环境与佛教的“天界”、“天堂”不仅在表面形式，而且在理性成分上，都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大乘佛寺选址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所以，大乘佛寺也多建于远离尘嚣的僻静山林中。高大的山峰成为人间与天堂的交接地带，而寺院就建在山峰或山峦之中。“崇山峻岭，茂竹修林”正是大乘佛教圣境的基本要求，可见其与名山圣境的密切关系。如《天台山方外志》在描述浙江天台山时说：“……而溪山排闥，一峰孤秀，赏而面势宽广，远山矗立，绝喧尘，离溃闹……”。既处深山而“绝喧尘”，又有“面势宽广”的特色，这也正是云南宾川鸡足山的环境形势特点。

名山圣境或者是由于宗教庙宇和宗教标志物的存在，或者由于在宗教历史的某个阶段具有重要意义（如宗教或教派发源地），或者更广泛地说，被认为是神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居住地，而使整座山，甚至整个区域都带有了神圣的色彩。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人们将对神的崇敬延伸到对神周围的物质环境，包括生物和物理环境的崇敬和自觉保护。“建寺即封山”，不仅是宗教机构或神职人员的要求，而且也群众的自觉行为。在圣境内及其周边地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干扰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通过立法、行政和乡规民约的形式将这种限制长期固定下来，从而使大片自然植被得以保存。与

前两类圣境相比, 名山圣境由于面积较大, 单个圣境在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即可具有区域性的影响。在大多数地区环境破坏十分严重的今天, 名山圣境的这种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以云南最著名的名山圣境——宾川鸡足山为例, 该山历史悠久, 名胜古迹众多, 植被具有典型的云南高原区植物区系特征, 区系成分呈现南北混合、东西交错的亚热带植物区系特点, 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在云南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鸡足山保留了许多典型的自然森林类型, 尤其保留着面积较大的地带性森林类型——半湿润常绿阔叶林。不仅保存了多种多样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种类, 而且保存了这一地区生物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研究宾川地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了理想的基地和背景。而且, 鸡足山还对整个宾川干热平坝区的生态环境有着巨大的影响, 作为重要的水土涵养地, 是炼洞河流域最重要的生态平衡维护者和水源地^[19], 对整个宾川盆地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再如, 位于楚雄以南 20km 处的紫溪山, 被认为是滇中地区仅有的保持完好的一片自然林, 而其保存在历史上主要是由于宗教庙宇的存在, 尽管这些庙宇目前大多已遭毁坏, 但这里的森林仍以乡规民约的方式而被自发保护起来。

4 圣境在现代自然保护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 过去大而连续的自然生境逐渐缩小并分割为小块。自然植被以片段化斑块的形式存在于景观中, 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在这一过程中, 圣境中的生物类群和相关的自然环境, 由于传统信仰文化的原因, 在总的环境逆退背景下得以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 成为许多地方现代农业景观中残遗自然生境斑块的重要存在形式。由于各种原因, 圣境的生态价值和在现代自然保护工作中的作用, 常常被一些决策者, 甚至一些科学家所忽视。

圣境的生态作用可进一步归纳如下。圣境不仅保护了存在于其中的生物类群和物种, 为生态恢复提供了一类重要的种源地。而且, 大小和形状各异的圣境以斑块的形式存在于农业景观中, 它们位于景观内不同的位置, 具有不同的土壤类型, 不同的植被类型和不同的隔离程度, 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提

高了景观异质性水平, 对于维持整个农业景观的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 它通过对水源地的保护, 减轻水土流失, 为有益鸟类、昆虫和微生物提供必要的生境等生态功能, 对维持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大多数农村地区, 区域性生物类群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些残遗斑块的维护和管理^[7]。不仅是由于这些包括圣境斑块在内的斑块中目前所保留生物类群和物种, 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这些斑块的维护或重建, 以增加景观结构单元的多样性和它们之间的连接, 从而达到维持和增加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平的目的。作者在对大理等地的实地考察中也看到, 在一些环境极度退化的地方, 随着宗教庙宇的重建, 周围几十甚至数百米内也开始了树木的建植。随着这些先锋人工群落的演替和发展, 必将为更多的物种提供所需的生态位, 从而成为区域生态恢复的基础。

云南近年来在自然保护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目前已建立各类正式保护地总数达到了 105 个, 但保护地总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约 4.9% (全国平均为 6.7%), 而且几乎都处于利用的重压下。Pelinck^[18]认为, 约一半的自然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实际上存在于保护地之外。由此可见, 现有的正式保护体系, 不仅在保护面积上, 而且在涵盖的生物类群上, 距云南作为我国生物资源最丰富省份的地位, 以及实现生态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均相差甚远。

世界上存在着两类自然保护体系。除主要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 由自然保护组织或政府机构建立的正式体系外, 还有另外一类, 即主要以传统文化和原住民知识为基础, 通过传统资源管理、民间禁忌和乡规民约而形成的乡土保护 (Vernacular conservation) 或传统保护体系。它主要以各类圣境、传统混农林生产、村社及家庭庭园等形式表现出来。圣境是其中最重要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最近在西双版纳的研究表明, 圣境可能是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最小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19]; 其物种丰富指数, 高于家庭庭院、耕地、集体林和经济作物园^[20], 是农业景观中重要的生物多样性集中地。国外的研究也表明, 圣境是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正式保护体系十分必要和积极的补充^[21], 可见其在自然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如前所述, 农业景观中的圣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传统生产和保护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 在一定区域内, 类型、大小各异的圣境以不同的数量和空间组合, 实际上构成了一类特殊的以传

统信仰文化为基础的自然保护体系——圣境自然保护体系。如果说现代保护体系的建立只是近几十年的事,管理上以政府法令和强制性的规章制度为特色的话,圣境自然保护体系则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并以多样化的乡规民约所体现的禁忌习俗、利用强度和方式,以及强烈的民间自觉和参与性为其特色。它是传统文化与特定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统一和协同进化的结果。作为一种迄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对群众日常生产和生活产生的持续影响的自然保护体系,圣境自然保护体系体现了传统信仰文化对自然保护的积极贡献,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事实上,许多现代自然保护区正是在历史或现实的圣境(特别是名山圣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圣境及自然植被历经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破坏而不同程度地保留下来,成为现代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较为典型的如大理点苍山、鸡足山、楚雄紫溪山等。根据我们的初步估计,在云南总共 105 处正式保护地(包括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中,35%以上是以名山(或水体)圣境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仍有超过半数的名山圣境,绝大多数的山林圣境未被纳入现代保护体系或在保护项目中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对庙祠圣境而言,虽然占据了历年所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绝大多数,但由于在管理目标上的局限,其作为“宗教植物园”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双重功能和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如何调整圣境保护区的管理方法和目标,进一步充分利用信仰文化的作用,将自然保护与群众的精神和物质文化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以提高保护区的效能,是摆在自然保护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将更多的圣境纳入现代保护体系,并在区域综合保护项目中充分重视和利用这种具有民间和传统特色的圣境自然保护体系,对于实现参与性保护,促进村社及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和云南生态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科学家,包括民族植物学家、生态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决策者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信仰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不止是对某些孤立的物种或只体现在物种水平(如神树、神兽崇拜)上,它通过圣境及圣境自然保护体系的建立和维护,在物种、群落、生态系统直至景观水平多个层次发挥着作用,对区域自然环境状况和生物多样性管理发挥着综合和深刻的影

响。在长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圣境已成为各民族文化和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保存地和物质化体现,是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的纽带。不可否认,许多圣境在 1950~1980 年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冲击,其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在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所占的地位有所降低。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对圣境的崇拜和保护仍然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近年来各地圣境的逐步恢复和朝圣人数的逐年增加就是证明。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和生态退化的普遍压力下,圣境以其现实和潜在生态价值,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宗教、民族问题和区域经济问题紧密的联系,其地位和重要性反而显得愈加突出。

参考文献:

- [1] Pei S.J. Mountain Culture and Forest Resource Management of Himalaya [A]. In: D. W. Tewari ed. Himalaya Ecosystem [C]. India: Intel Book Distribution, 1995. 114~120
- [2] 赵士洞,郝占庆.从“DIVERSITAS 新方案”看生物多样性研究发展趋势[J].生物多样性,1996,4(3):125-129.
- [3] Arize L.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J]. Nature & Resources 1996, 32 (1): 1
- [4] Ramakrishnan P. S. Conservation the Sacred Species to Landscape [J]. Nature & Resource, 1996, 32(1): 11~19.
- [5] 郑霖.论中国名山的分类[J].山地研究(现名《山地学报》), 1998, 16(1): 21~26
- [6] 吴征镒.云南植被[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123~271
- [7] 刘宏茂,许再富,陶国达.西双版纳傣族“龙山”的生态学意义[J].生态学杂志,11(2):41~43
- [8] 吴兆录.西双版纳勐养自然保护区布郎族龙山传统的生态研究[J].生态学杂志,1992,16(3):45~49
- [9] Pei S.J. Some Effects of Dai People's Cultur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upon the Environment of Xishuangbanna, Yunnan, China [A]. In: Hutteres K. L, ed. CULTURAL VALUES AND HUMAN ECOLOGY IN SOUTHEAST ASIA [C]. The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98.
- [10] 张桥贵,陈麟书.宗教人类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131
- [11] 云南林学会.云南古树名木[M].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5
- [12] 颜思久.云南省志 第66卷(宗教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1~174
- [13] 沈安波.新编云南省情[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81~83.
- [14] 许再富.西双版纳傣族贝叶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J].生物多样性,1995,3(3):174~179.
- [15] 刘沛林.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M].上海: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251.
- [16] 云南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自然保护区[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302~312
- [17] Simberloff, D. The Con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Biology

- to Conservation Science[J] . *Ann Rev Ecol syst*, 1988, 19: 473~ 511.
- [18] Pelink, E. Community — focused Approaches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J] . *ICIMOD Newsletter*, 1998, 31: 4~ 5.
- [19] 刘宏茂, 许再富, 陈爱国. 西双版纳土地利用的不同管理方式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评价探讨[J] . *植物生态学报*, 1998, 22(6): 518~ 522.
- [20] 付永能, 陈爱国, 崔景云. 西双版纳大卡老寨农地景观与物种保护的关系[J] . *植物资源与环境*, 1999, 8(1): 28~ 32.
- [21] Editorial. Sacred Places and Vernacular Conservation[J] . *Info MAB*, 1995, 23: 20~ 21.

Sacred Site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Environmental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Yunnan, China

LUO Peng, PEI Sheng-ji and XU Jian-chu

(*Kunming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unming 650204 China*)

Abstract: At a time when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loss of biodiversity have been taking place at an alarming rate, in Yunnan a large number of plant communities and species are preserved in various sacred sites, a kind of landscape patches which are formed and traditionally protected for cultural belief reasons. Religious backgrounds of these patches are very rich and complex. These sacred sites, with an estimated total number of over 5 thousand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province, were classified into 4 types: water body, grove, temple, and mountain. In a watershed, different types of sacred sites, with various sizes, shapes, habitats and isolation situations, constitute a culture-based natural reserve system, i. e. sacred-site reserve syste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vernacular conservation and a useful complement to modern preservation frameworks, this system has been playing a very active role in environmental and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t both community and regional levels. The origination, distribution, ecological value and other properties of the latter three types were given and analyzed with examples. Finally, the necessities of integrating this system into modern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the potential uses of it in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and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in rural areas, were suggested.

Key words: sacred si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